

热河普陀宗乘之庙 乾隆朝建筑原状考

杨 煦

内容提要 清乾隆年间在热河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经清中晚期变迁及20世纪修缮工程，建筑现状与乾隆朝已有较大出入。本文基于田野考察、修缮工程师访谈、清宫档案文本和历代图像资料，对该庙乾隆朝的建筑原状进行了细致考证，包括已塌毁的无量福海殿、九间房，形制发生改变的大红台群楼、御座楼区域、平台殿，非原始设计而属后续添建的塔罩亭、千佛阁以及档案名称失载或功能被误判的“呀嘎达噶楼”、“哑巴院”等组成部分，捋清了该庙原初形制、变化时间节点和称谓指代。对原状的考证为进一步的建筑史研究提供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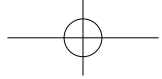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关键词 热河 普陀宗乘之庙 乾隆 建筑原状

普陀宗乘之庙〔后文简称为“普庙”，图一〕建于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767—1771），系乾隆皇帝为其本人六十寿辰和其母崇庆皇太后八十寿辰庆典而敕令兴建。普庙占地22万平方米，是热河外八庙建筑中规模最大的。它位于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北部狮子沟峡谷的北侧山体上，坐北朝南，占据了整个狮子沟寺庙群的中央位置。庙名中“普陀”为梵文Potalaka（音译普陀洛迦，亦称补陀洛山）的简写，即佛经所载观音菩萨住地，义同布达拉宫的梵文名称；“宗乘”是佛教弘扬某派教义的道场，“普陀宗乘”即观音菩萨道场之意。

现存普庙建筑为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复原修缮之产物，与原先遗存已有差异；而修缮前的建筑，保存的是清代后期的状况，历经演变，亦与乾隆朝初建面貌有所出入。对该庙的深入认识，必须建立在对乾隆朝原状的考证基础上，本文即拟从实物、文献与图像三方面对其原状加以讨论。

今日所见普庙，在平面上由南向北可分为前院、白台群和主体建筑三部分〔图二〕。前院轴线上的山门、碑亭、五塔门及东西旁门、角楼等形成一个具南北轴线的封闭院落；由五塔门向北即无明显轴线，一条蜿蜒的甬道穿过琉璃牌楼向山巅延伸，两侧散落分布近30座藏式白台平顶建筑；主体建筑坐落于山巅人工堆起的土丘前。

主体建筑作为全庙功能与视觉形象的核心，有实心花岗岩条石垒砌的白台基座，面积广大，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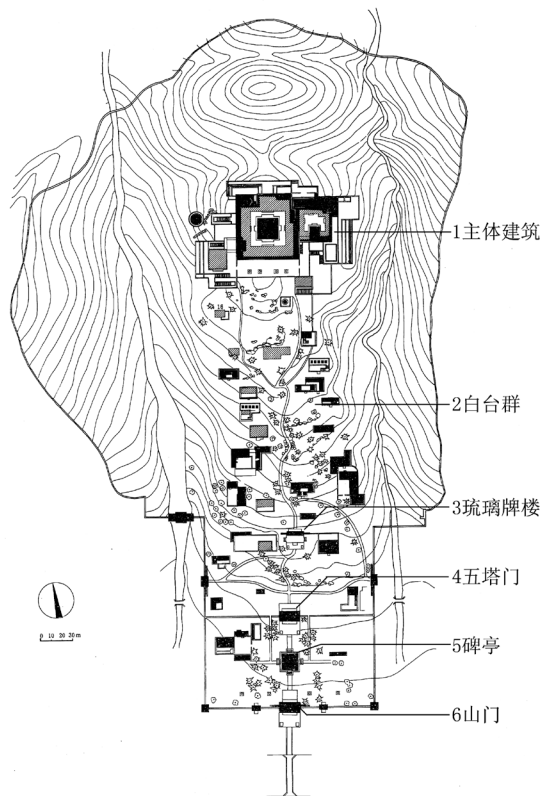


〔图一〕普陀宗乘之庙现状鸟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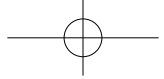
〔图二〕普陀宗乘之庙总平面图

采自天津大学建筑系、承德文物局《承德古建筑》页284, 19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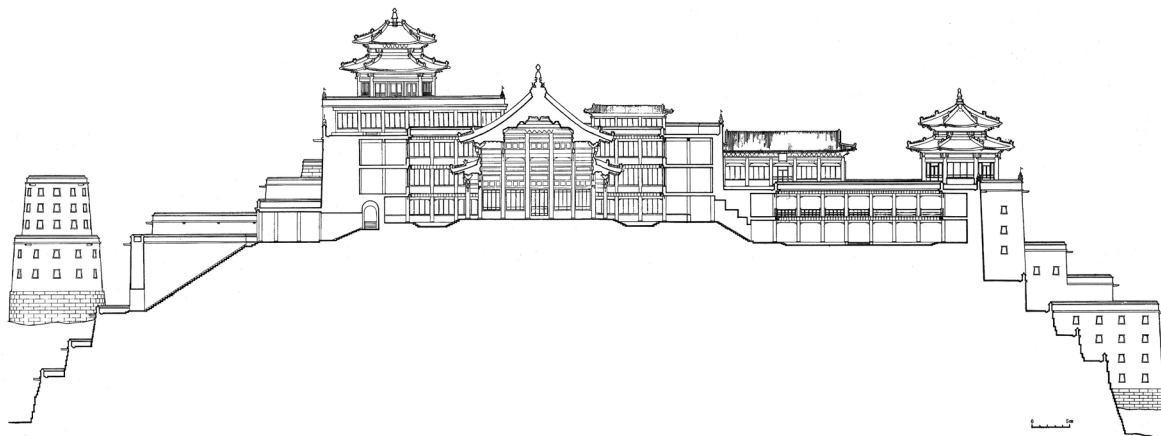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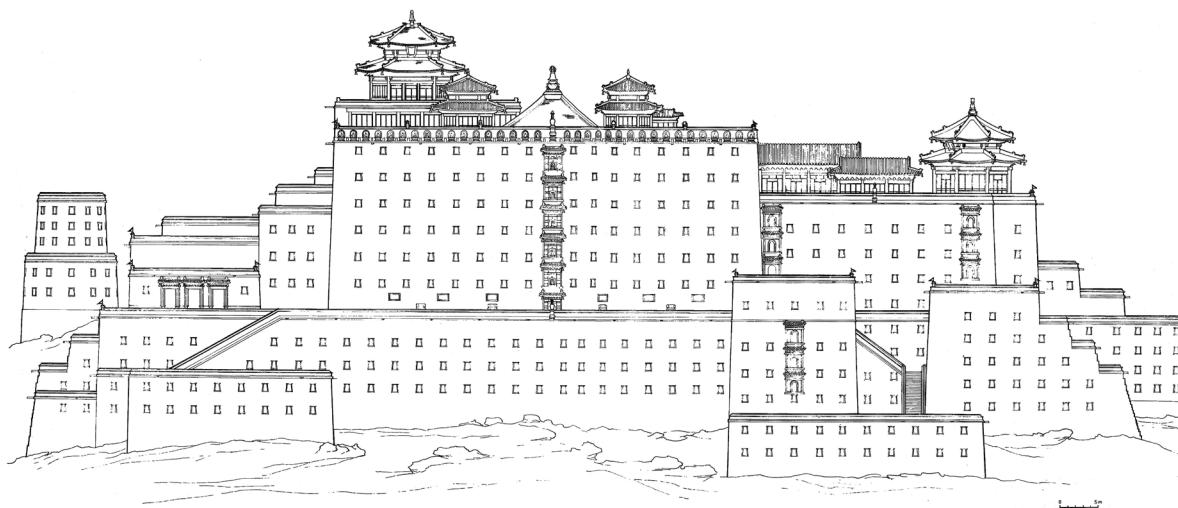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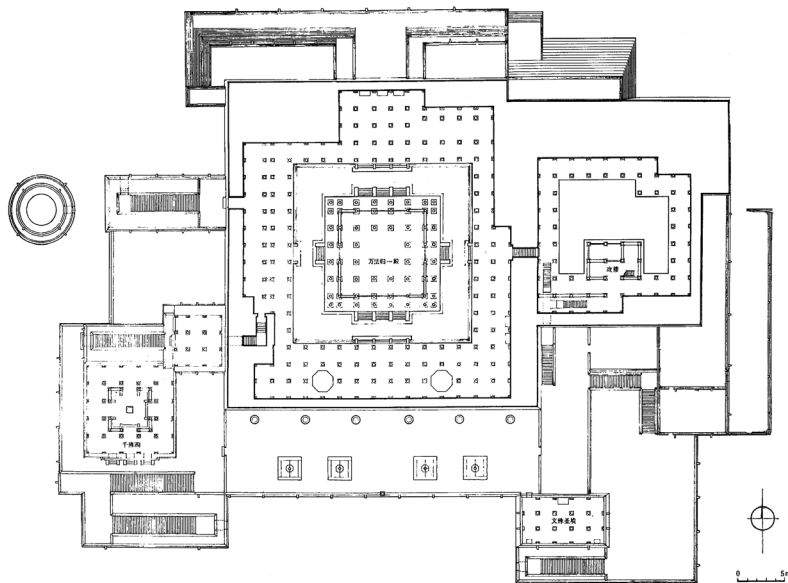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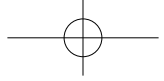
四面群楼围合成的大红台位居基座正中，群楼天井中为核心殿堂——“万法归一”殿。大红台北楼西端顶部凸起一层，上有重檐六角形六方亭，匾额为“慈航普渡”；南侧楼体顶部左右各有重檐正方形塔罩亭一座。紧贴大红台东侧有一稍矮、面积稍小的四面群楼，高两层，称“御座楼”。白台基座上，还分别在大红台西南侧建有单层藏式院落“千佛阁”、御座楼东南侧建有哑巴院。在白台基座之外，东南侧紧贴基座有一立于较矮白台基座上的四层平顶楼体“文殊胜境”；西侧靠北有一独立于其他建筑的二层圆堡。由平地登上白台基座的蹬道有三组，分别为千佛阁南侧两折蹬道、文殊胜境南侧折向哑巴院西侧两折蹬道以及圆堡东侧楼体内蹬道。此外，白台基座东、西、北三侧都有加固楼体避免滑坡的实心钺台〔图三〕。

笔者对乾隆朝建筑原状的考证基于对宫廷档案文本、图像资料的利用，对现场的考察和对20世纪初欧、美、日学者图文记录和现代测绘资料的阅读，以及对该庙1980年代修缮工程师的访谈。笔者所用宫廷档案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活计档，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之《钦定热河志》，乾隆五十四年普庙陈设档，嘉庆十八年《热河园庭现行则例》以及庙中碑文等。



〔图三〕普陀宗乘之庙主体建筑现状的平面、正立面、纵剖面 采自《承德古建筑》





一 见于档案、今已无存的建筑

(一) “无量福海”殿

乾隆五十四年《陈设档》载：“广圆妙觉二山门一座……威严总持东山门一座；宝光普耀西山门一座；无量福海殿一座，明间面南宝座床一铺……对面面北紫檀木案一张……左右设楠木三屏峰（风）二座……东间面北宝座床一铺……左设紫檀木炕案一张……右设紫檀木炕案一张……西面紫檀木案一张……西间面东紫檀豆瓣楠木心琴桌二张，左右设楠木三屏峰（风）四座……普门应现琉璃牌楼一座。”¹¹其中“二山门”当指碑亭后的五塔门，其上悬挂“广圆妙觉”匾；东西山门、琉璃牌楼今亦存；而“无量福海殿”则为今日庙中所无。观察《陈设档》对建筑的记述方式，基本按照方位顺序由南至北、由轴线至旁路逐个记录，故推测“无量福海殿”应居于五塔门、东西山门及琉璃牌坊围合成的区域中。《钦定热河志》卷八十《寺庙四》称“前殿八楹，额曰无量福海”，以“前殿”称呼无量福海殿，也可见其位居寺庙进深序列的前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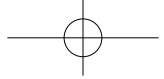
经笔者实地考察，普庙前部五塔门与琉璃牌楼之间距离甚大，从尺度上可以安排一座相当体量的殿堂而不致逼仄〔图二〕。该处现状为一片无建筑存在的坡地和假山，高于五塔门地平而低于琉璃牌楼地平。据负责20世纪80年代普庙修缮工程的承德市文物局王福山先生告知，该处假山为1976年地震后归安，修缮前踏查中曾发现西南位置尚存台基条石一块。据此，该处或为普庙前部中心主殿——无量福海殿之原址，其高度大致与今台地南端两株松柏根部齐平（因该两株松柏树龄大致可推至乾隆年间）。

《钦定热河志》虽提到前殿“无量福海”，但书中所附普陀宗乘之庙全图〔图四〕的轴线上却无此殿堂。热河外八庙中前汉后藏式寺庙存在一种现象，即前部汉式主殿很可能于寺庙宣布竣工甚至开光使用后才在某一时间开始建造。乾隆二十二年普宁寺工程查勘称：“热河普宁寺工程三样楼上架枋梁大木……下架柱木……大悲菩萨现在使头遍布……各部洲并日月台已经彩画合糙，各部洲佛像……北部洲两边抄手墙……庙西喇嘛厨仓房、马棚等座俱已完竣。”¹²其中三样楼（即大乘之阁）、各部洲、日月台乃至仓房马棚等次要建筑均有记录，前部中心主殿——大雄宝殿却未提到。普宁寺虽于乾隆二十四年最后完成，但“主体工程仅用了一年时间”，从乾隆二十年夏天动工，“至次年春天便大体竣工”¹³，故普宁寺至少在主体工程（指后部藏式部分）完成时还未建造大雄宝殿。至乾隆五十二

〈1〉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清宫热河档案6》页337—37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就笔者所知，普庙至少还存在嘉庆十三年和光绪二年两部陈设档，有关乾隆以后清代的改建情况有望从中寻找线索。遗憾的是，目前这些档案处于封存状态，也没有出版物、电子档、胶片等载体收录。

〈2〉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吉庆奏报查勘普宁寺等处工程情形折》。《清宫普宁寺档案》第一册，页1—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3〉 孙大章：《承德普宁寺——清代佛教建筑之杰作》页14，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



〔图四〕乾隆四十六年《钦定热河志》附普陀宗乘之庙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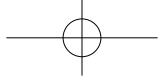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年方见“普宁寺大雄宝殿前檐拆换红砂滴水石……”^{〔1〕}，可见大殿或于二十二年至五十二年间择机建造。安远庙的普渡殿位于后院，前院却是一片空地，从未有过任何殿堂，但中央甬道两旁所植树木历经多年始终无法长大，勘察发现树木下方有修筑好的地下基础，使树根无法向下生长^{〔2〕}。其前院当规划有中心主殿，为等待某一事件的发生而预留，但事件终未发生，殿堂便始终没有建造〔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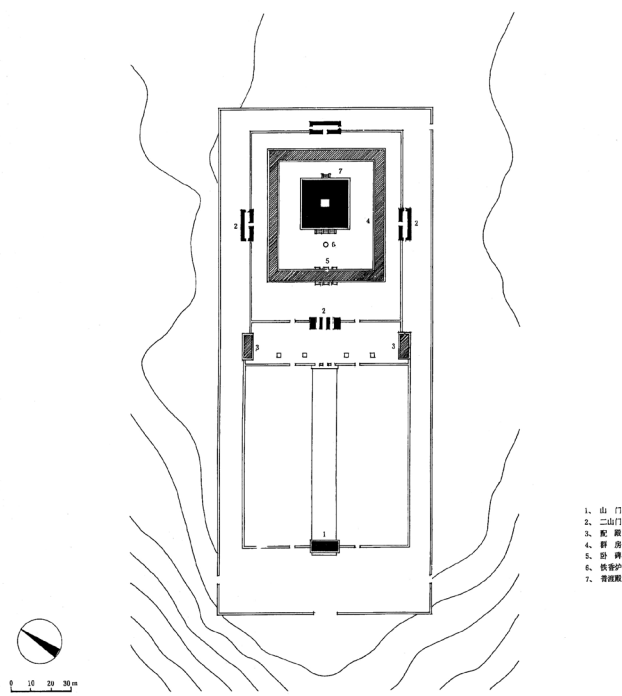
“无量福海”殿很可能也为稍晚修建，《热河志》附图或绘制稍早，便没有绘出该殿，而稍后撰写的文字则予以收录。“无量福海”存在时间不详，笔者所见其在档案中最后一次出现为道光十二年三

〔1〕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军机大臣和坤等奏销乾隆五十一年热河永佑寺普宁寺等工所用银两折》，前揭《清宫普宁寺档案》第一册。

〔2〕 承王福山先生告知。



〔图五〕预留前部主殿位置的安远庙平面 采自《承德古建筑》



月二十七日^{〔1〕}。关于该殿形制，《热河志》载其“前殿八楹”，可能为面阔七间的殿堂^{〔2〕}，尚难推测其地盘样式。

（二）“九间房”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布达拉庙工程成数》及七月的两份朱批奏折，在论述主体建筑情况时，均提到一处“九间房”建筑的施工情况，为今日庙中所无。七月初七奏折载，“布达拉庙工除西面九间房并……俱已完竣外，现今……”^{〔3〕}表明“九间房”位于西侧，而该“西面”的方位基准并未指明。时隔多年后的道光十二年工程清单中，则提到“布达拉九间房大木沉陷，间有坍塌”^{〔4〕}。

该“九间房”建筑，在今普庙中并不存在。档案也缺乏对“九间房”更加详细的记述。道光十四年六月初六武忠额、阿灵阿请示施工的奏折，虽未提到“九间房”的名称，但笔者认为不可忽视其内容与“九间房”的关系：“查得布达拉庙大红台西面白台以上穿堂门罩三间系三进计九间，头停坍塌地脚。缘系倚就山势高低叠落抱砌，所有大料石俱已膨闪，内里填廂所筑灰土沉陷至六七尺。今著照旧修尽，诚恐所用钱粮过重，竟撤去此项穿堂房间，似亦无所关碍。惟此穿堂门口系喇嘛僧众逐日上殿出入，并护守兵丁巡更必由之路，不得不量为修理，以便行走。今拟将穿堂门罩九间全行拆去，毋庸补盖。所有拆卸物料除抵用外，余皆妥为存贮。”^{〔5〕}

文中“大红台西面白台以上”，将方位指向大红台西侧白台基座上千佛阁至基座西北角一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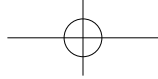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道光朝奏折，道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保昌奏《呈热河各庙工程情形清单》，档号03-2822-043(为042附件)：“无量福海殿、都罡殿、四面群楼头停台顶均有坍塌渗漏、木植糟朽。”

〔2〕 承曹鹏先生提示，明清时期档案中以“楹”数记载建筑开间数目的记法较为混乱，时指开间数，时指柱子数。如《明太祖实录》同一文献中，记述南京正阳门外群神享祀组群时以开间论，为奇数；而记述山川坛和南郊大祀殿则以柱数论，为偶数，见曹鹏：《明代都城坛庙建筑研究》页42、52、57，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而普庙陈设档记无量福海殿为偶数楹，记万法归一殿为奇数楹，当为类似情况。因正殿偶数开间不甚合理，故推测其为七开间。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档号04-01-37-0029-001。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道光朝奏折，道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档号03-2822-043(为042附件)。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十四年六月初六，档号04-01-37-00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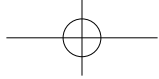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图六〕〔德〕恩斯特·柏石曼 (Ernst Boerschmann) 于1906年所摄主体建筑西侧情况 采自Ernst Boerschmann. *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 Verlag Ernst Wasmuth A-G Berlin, 1926. p.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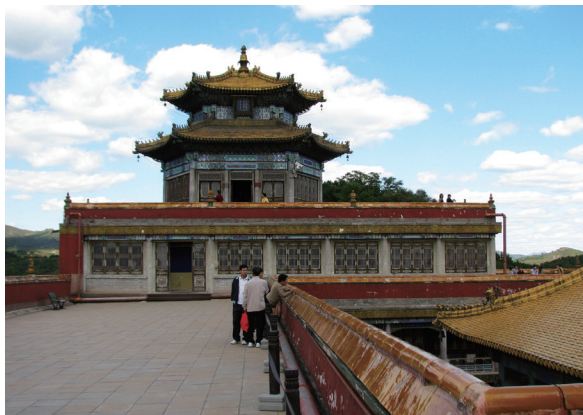
而“穿堂门罩”与“上殿出入……必由之路”，则明确指出该处作为出入口交通空间之功用。这座三间三进计九间的门罩，与“九间房”之名称直接关联，且前引道光十二年档案显示“九间房”大木沉陷坍塌，两年之后的道光十四年即完全坍塌，时间上是吻合的。可以断定，“九间房”所指正是大红台西侧一座穿堂门罩。

文献中“白台以上”的描述，似非指设于白台以外由平地登上白台基座的蹬道，而当指由白台基座登上大红台群楼一层的蹬道。千佛阁北侧即设有蹬道通向大红台一层西南角。实地考察可知，该蹬道埋于一方形楼体中，蹬道顶端通过一方形平台与大红台入口连接。方形平台上尚存4×4共16个柱础遗址，表明该处曾有三间×三间的建筑，1906年普庙西侧照片的中心位置门洞所在楼体上方的小型方楼为包围九间房遗址的围墙〔图六〕。该建筑正处于蹬道与大红台入口之间，必为一交通空间，形成大红台西侧入口的“门罩”。九间房究竟拆卸于何时仍然存疑，因为虽然大臣为节省入不敷出的钱粮主张拆除并将地基夯实，但道光帝却颇具深意地批注道：“看汝等总在用工之多寡讲究，未明朕意也。另有旨。”^{〔1〕}笔者并未找到道光帝的额外旨意。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十四年六月初六，档号04-01-37-0095。



〔图七〕被拆除大部、仅剩局部的群楼顶层（南向北）



二 形制发生改变的建筑

（一）大红台群楼

大红台内部群楼现状为整体三层、局部四层，即北楼西部第三层上高出一层，仅宽七间，作为六方亭（慈航普渡）的基座〔图七〕。但道光朝之前的所有档案却均记为整体四层。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布达拉庙工程成数》载“都纲殿……周围四层群楼柱木树得”；嘉庆十二年

十月福长安等奏：“布达拉大红台四层群楼一座，台顶裂缝沉陷渗漏直至下层……”^{〔1〕}除奏折外，乾隆五十四年普庙的《陈设档》亦分四层记录了大红台群楼内的陈设，记录方式为“头层……二层楼……三层楼……四层楼”^{〔2〕}，而且最上一层的四面均录有大量重要陈设，说明第四层与下面三层一样是完整的四面楼，并非仅六方亭下高出的一层基座。

而道光朝后的记载则变为三层。道光十五年管庙苑丞盛详呈报：“热河布达拉大红台内四面三层群楼铺板、大木承重间枋，间有糟朽……”^{〔3〕}光绪三十年松寿奏：“四面群楼系平台式上下三层，每面十二间。”^{〔4〕}

除文献材料外，在由宫廷画师绘制的表现乾隆三十六年普庙落成典礼法会之《万法归一图》中，也将大红台第四层绘制为完整的四面，而非局部加高〔图八〕^{〔5〕}。如果说认为该图或许出于为了表现庆典场面需要而脱离实际，以完整四面楼获得更为规整的背景建筑的话，那么，在此还可提出另一幅产生于乾隆朝的图像，以支持整体四层的事实，即《钦定热河志》附普庙全图〔图四〕。图上，六方亭下亦非现状的局部基座，而是完整的四面群楼。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画师William Alexander随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期间，将当时普庙的形象绘制在铜版画上〔图九〕。画中的大红台比今日更为高耸，六方亭下亦无基座，红台顶部为完整的四面楼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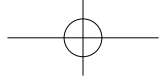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1〕 宫中朱批奏折，嘉庆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清宫热河档案10》页558，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2〕 前揭《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页357—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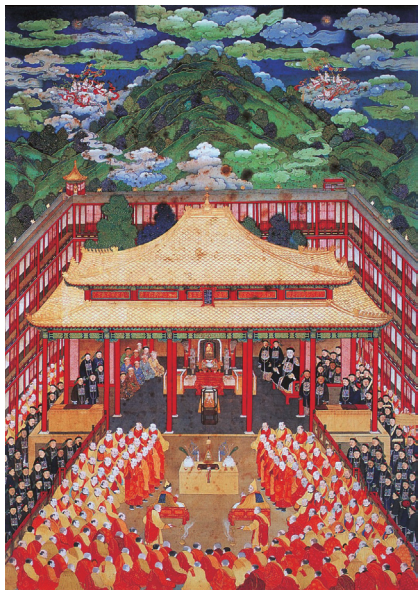
〔3〕 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十五年闰六月二十八日，《清宫热河档案15》页78。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档号04-01-37-0146-012。

〔5〕 杨煦：《两幅宫廷绘画所见建筑图像表现比较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该文发表时，笔者尚未进行普庙乾隆朝建筑原状的文献考证，文中认为《万法归一图》将三层绘为四层是为创造窄高空间而脱离实际为之。由本文所涉文献来看，该图这一细节与乾隆朝档案记载是一致的，特此更正。



〔图八〕《万法归一图》，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廷绘画》图141，
文物出版社，1992年



〔图九〕乾隆五十八年William Alexander随马夏尔尼访华时所绘铜版画中的普庙形象 采自Thomas Allom.
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 London: Fisher, 18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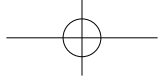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红台群楼最上层的消失，或许由于立于山体上之高耸砖结构极易坍塌。普庙完工后的第四年（乾隆四十年），主体建筑就发生了严重的坍塌事故。英廉向皇帝报称：“本月十五日由本报接到尚书忠勇公福隆安寄到，钦奉谕旨垂示布达拉庙坍塌情由，令奴才查办该工监督拜唐阿匠头一事。奴才恭读之下，实深惊异。伏思布达拉庙工程所用钱粮甚多，理应坚固经久，始非虚费。若数年之间即至坍塌，则所用钱粮俱置于何地？今竟坍塌不堪至于此极，当日承修官员下至匠役其中由弊混而生草率之情伪不问可知。”^{〔1〕}

崩塌发生后，虽经加固，过高的楼体相对于早期处理不善的山地基础而言仍是不稳定的。从文献记述看，完整的顶层当在嘉庆十二年至道光十五年之间被拆除。目前可见档案中，这一时期有关普庙工程的较重要记载是在嘉庆十七年，当年雨水较多，上半年便经常奏报“渗漏残坏，墙垣泊岸沉陷闪裂坍塌”等情形，七月二十七日皇帝上谕说“此次普陀宗乘庙工修理甚为坚固，承办各员尚属认真……”^{〔2〕}推测应为一项较重要的修理工程^{〔3〕}。群楼顶层或因不断坍塌损坏，而在此次修理中被去掉，以降低建筑高度，使其结构稳定。现藏美国纽约洛克菲勒财团档案室的一套《热河园庭外庙

〔1〕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四十年七月十八日，《清宫热河档案2》页43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2〕 军机处上谕档，嘉庆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宫热河档案12》页184。

〔3〕 承杨菁女士提示，乾隆四十五年所见北京香山宗镜大昭之庙的台体在建成后不久也曾缩减过层数，或许遇到同样的结构问题。另据曹鹏先生提示，嘉庆十六年、十七年左右出现了一个皇家建筑改建的高潮，包括圆明园、香山部分建筑的改建及景陵大碑楼的大修等，也出现了较强的建筑设计团队。在这一营建背景下考虑普庙大红台的改造，是纯粹技术结构原因需要改动，还是嘉庆帝另有其想法，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图十〕洛克非勒财团档案室藏《热河园庭外庙图》之一（刘阳先生提供）



图》，是迄今所见热河建筑最为精准的清代绘画。根据图中所绘避暑山庄内建筑存废状况推断，整套图应绘制于清嘉庆至道光时期¹⁾。其中一张用西方透视手法绘制了普庙的鸟瞰图〔图十〕，记录了该次改建之后不久的状况。图上大红台的最上层已经拆除，仅存六方亭下的一段。

红台群楼这一变化，至少提示我们注意两个重要情况。

第一，红台西群楼最上两层内之陈设，原为“六品佛楼”的建构，这是乾隆朝独创的一种建构模式，对乾隆皇帝本人具重要意义。罗文华先生称普庙六品佛楼为红台西群楼的二、三两层，是指今日状况而言，而根据本文考证，乾隆朝六品佛楼应为三、四两层²⁾。这也正是乾隆四十年的坍塌如此严重，顶层却并未被拆除，而是消失在嘉庆朝的原因。第二，现在远眺大红台，可见“万法归一殿”重檐金顶之上部(约占屋顶全高42%左右)突出于群楼楼顶，似从群楼中伸出，却又未能全露，但据本文研究可知，既然群楼原为四层，则原先的“万法归一殿”金顶应全部被群楼包围，无法露出。

（二）御座楼区域（含八方亭、曲尺白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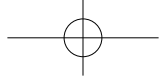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今日普庙大红台东侧有一稍矮、面积稍小的四面群楼，高两层，称“御座楼”。御座楼南侧楼顶上突出一单檐歇山顶小殿；北侧楼顶靠西修有单檐单层歇山顶之“洛伽胜境”；北楼体向东突出一段，顶部建有重檐八角形的八方亭(匾额为“权衡三界”)。据文献与图像两方面所反映的信息，御座楼区域在乾隆朝的情形与今日相差甚大，建筑名称也较为复杂。

乾隆五十四年《陈设档》载：“普门应现琉璃牌楼一座……文殊胜境殿一座……普胜三世头层明间……西次间面东宝座床一铺……东次间面南高矮床二铺……二层楼西次间面东宝座床一铺……东次间面南宝座床一铺……三层楼明间……东次间……西次间……洛伽胜境楼……”³⁾据此可知存在一座名为“普胜三世”的三层楼。分析《陈设档》对建筑的记述方式，为按照方位顺序逐个记录，档中对“普胜三世”记述顺序在“文殊胜境”与“洛伽胜境”之间，可见该楼为主体建筑之一部，且在大红台之

〈1〉 据2011年12月23日与刘阳先生的私人通信。

〈2〉 罗文华：《清宫六品佛楼模式的形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

〈3〉 前揭《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



东侧，当立于白台基座上，位置在今“御座楼”一带¹。

“普胜三世”并未在宫廷往来奏折中出现，但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六《布达拉庙工程成数》称，“御座三层楼钉安挂檐板，安装修铺幔地面，周围二层群楼柱木树得”；七月初七日朱批奏折称，“御座三层楼顶板并装修地面俱完，现在糊饰二层。群楼顶板并装修安得，现今铺幔方砖……东面曲尺白台、城砖台身砌得……”七月十八日朱批奏折称，“御座三层楼并群楼……柱木装修油饰已得……东边曲尺白台……”²从行文叙述的条理可知，“御座”处存在一座三层楼房，并且该楼周围另有“二层群楼”，二者有所区别。今日所称“御座楼”为高二层的四面群楼，同“御座三层楼”当有所区别。奏折中“御座三层楼”即或为《陈设档》中的“普胜三世”楼，从该楼陈设来看，布置有多处宝座床，是整个庙中宝座床最集中处，且陈设档仅在该处提到有“净房”（即厕所）的设置，应为一重要的皇帝驻蹕处，“御座”之称或许即与其有关。而周围的“二层群楼”，陈设档中未载有任何陈设，可见其并非“御座楼”之主要指称对象。《热河园庭现行则例》有关外八庙匾额的全面记录中出现了“普胜三世”的名称，列于“御座”条目下，与“洛伽胜境”并列³。另外，群楼东侧还存在“曲尺白台”。综上，御座楼区域建筑在乾隆朝之形制远比现状复杂，至少存在“普胜三世”三层楼、周围二层群楼、洛伽胜境楼（即“七辈喇嘛楼”，后详）和东侧曲尺白台四个主要部分。

该区建筑原状究竟如何，文献未给出更明确的指示，但观察现存建筑，今“御座楼”北侧实心墙体的厚度相当于其他三面墙体的数倍（图十一），如此厚的墙体，绝非仅仅用作“洛伽胜境”殿与八方亭的台基。据王福山先生告，修缮施工时在大红台一层、二层回廊东北角内均发现，从大红台北侧群楼东端向东通向现御座楼北侧实墙的位置有砌死的门的痕迹（图十二），表明御座楼北侧厚墙曾经为建筑空间，后来才用砖填塞为石墙；而且施工中曾向御座楼西、北两面实心墙体中试掘，发现在砖墙中包砌了柱础；大修前所摄墙体表面（图十三）可明显看到不均一的砖砌形式，此情况表明御座楼北侧厚墙内曾经并非实心，而是一空心楼体，其被封填砌实或许也发生在嘉庆朝的大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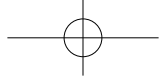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关于“普胜三世”之“三层”的层数，若以今日建筑状况论，该区域唯一的三层部分是二层群楼南楼中间的所谓“戏台”，其东西与群楼回廊相连，面阔三间，向天井中突出两间，高三层，顶层突出于周围群楼。查热河档案与《清升平署志略》，既无任何曾在普庙演戏的记载，也未见庙中有“戏台”之设，究竟从何时始称“戏台”已难考⁴。关野贞曾对该称谓提出质疑：“这座建筑究竟是不是戏台？因为我未见过很多中国戏台，故难以断定。但根据我们最初调查时高木主好意借给我们的图（这些图只是简单的草图临摹，不知出处），此图将前述洛伽胜境殿标注为‘御座楼’，而将此楼写成戏台，

1、 《钦定热河志》载大红台顶之六方亭（即慈航普渡）楼上匾额曰“普胜三界”，但陈设档后文将六方亭直呼为“慈航普渡殿”，且从上引文可知“普胜三世”为一座三层楼房，每层至少三开间，规模也绝非六方亭可比，可知“普胜三世”并非“普胜三界”之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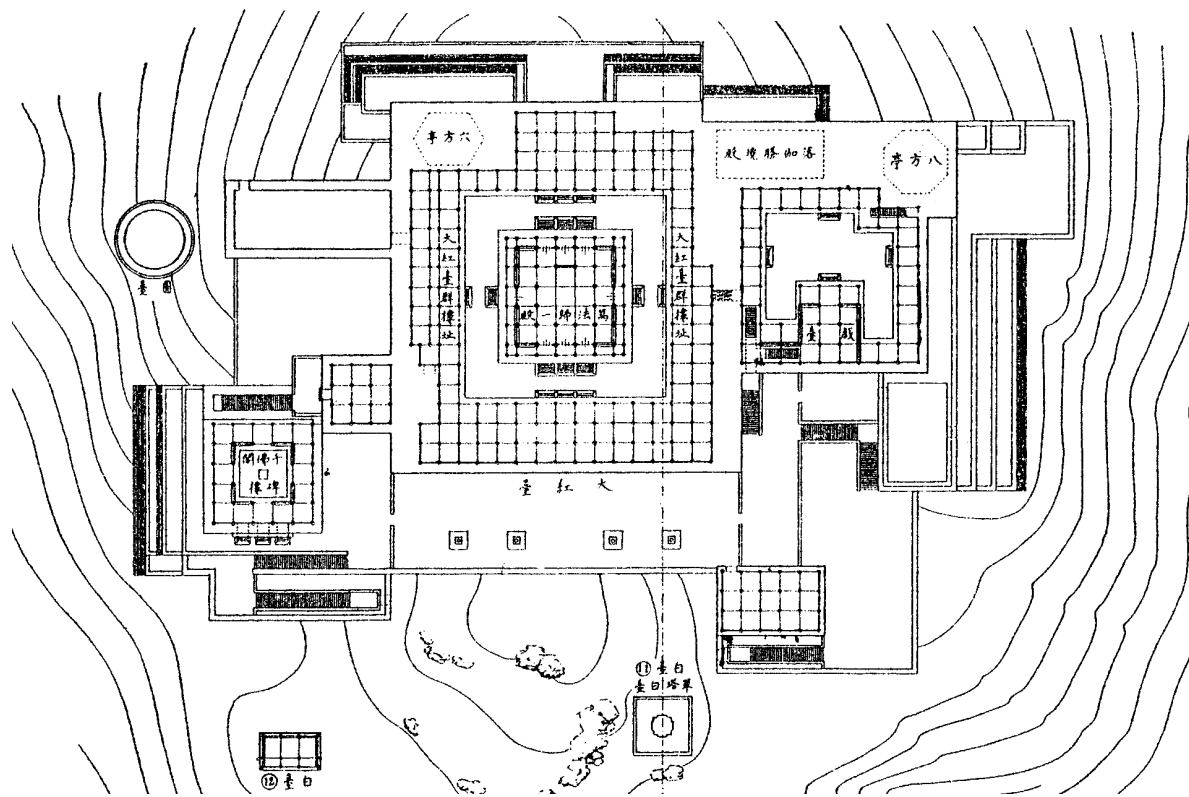
2、 前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朱批奏折。

3、 《热河园庭现行则例》，载王世襄主编：《清代匠作则例》第三卷，页145，大象出版社，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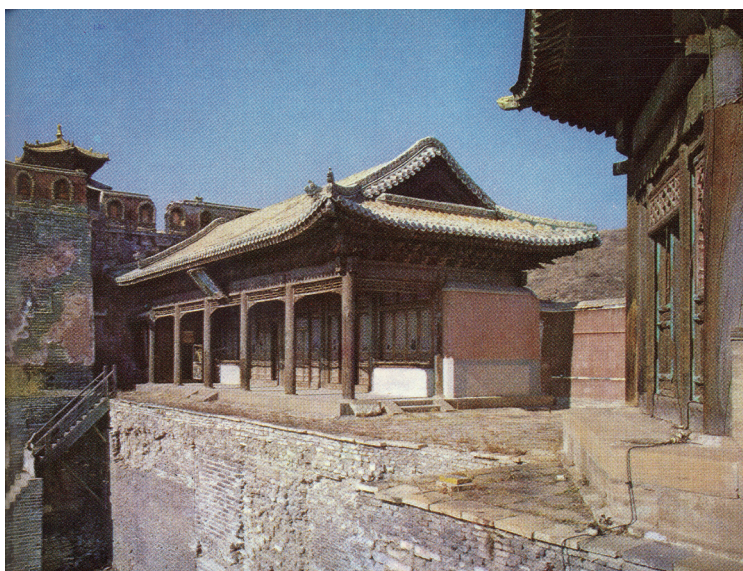
4、 现代部分介绍材料称“逢皇帝或太后万寿之际在该处演出藏戏”，但无任何原始文献档案支持这一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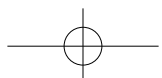
〔图十一〕关野贞、竹岛卓一发表于1937年的测绘图局部 采自 日 关野贞、竹岛卓一：《热河解说》，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3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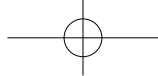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图十二〕大红台群楼北一层通向洛伽胜境殿下方实心楼体中的门被砌死处



〔图十三〕今洛伽胜境殿及其下方已被砌为实心的楼体 采自《承德古建筑》





只能姑且接受这种说法。”¹可见，“戏台”之称或为以讹传讹。御座楼区域在大修前仅存外围砖墙，回廊和“戏台”现状为20世纪复原设计²。虽然该处的层数与“普胜三世”相符，但考虑二者间的关联却存在困难。一方面，乾隆朝《热河志》所附普庙全图[图四]上的御座群楼南侧顶部并无高出的一层，乾隆朝可能没有该设置；另一方面，“戏台”背对群楼南侧砖墙，面向天井，实为坐南朝北，亦颇难解释。

事实上，御座楼区域建筑的改动除前述北侧楼体被填实砌死外，还涉及“曲尺白台”的拆除。《热河志》附图[图四]上大红台东侧呈“口”字形天井的是今御座楼，在这组楼体之外，沿东、南两侧筑有折尺形的平顶矮楼，折尺的南段西端似通过一斜向蹬道通向“文殊胜境”楼的底部，并进一步连接“文殊胜境”楼南边的蹬道³。该建筑现已不存，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六《工程成数》记“东边曲尺白台应拆砌台帮已拆至大料石，现在接砌红砂大料石，安得六层，现安第七层”；六月十六又记“东面曲尺白台红砂大料石安得十一层，现安第十二层，南北二面接砌台帮”，其中“曲尺白台”与[图四]中折尺形矮楼当有对应关系，似为一下白上红的石砌建筑。该处或在乾隆四十年被改建为加固御座楼体的戏台（详见后文“哑巴院”部分讨论）。从这些变动来看，该区域的变化相当大，乾隆朝很可能没有“戏台”这一建筑物，其第一次出现于图像已到嘉道年间[图九]，故难以建立“戏台”与“普胜三世”的关系。“普胜三世”楼最可能的存在，仍是前述御座楼北侧厚墙被填实前的楼体，其内部结构未知，尚不能解读“三层”何来。

在御座楼区域，除“普胜三世”外，“洛伽胜境”也经历了复杂沿革。乾隆五十四年《陈设档》记“洛伽胜境楼一座……二层楼北面墙挂七辈喇嘛像七轴，随黄缎帘”⁴。结合“洛伽胜境楼”二层的陈设，再来看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奏折“七辈喇嘛楼扇面墙槛墙并装修俱得……”⁵；七月十八奏折“御座三层楼并群楼、七辈喇嘛楼柱木装修油饰已得”⁶，可推知所谓“七辈喇嘛楼”与“洛伽胜境楼”的关系。今日庙内无“七辈喇嘛楼”之称，20世纪初照片中与今天复原重建的“洛伽胜境”均为御座楼顶北侧靠

〈1〉 关野贞、竹岛卓一：《热河解说》页186，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37年。原文为日文，蒙黄荣光女士、周诚先生协助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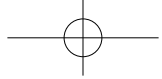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2〉 与普庙主体建筑形制相似的须弥福寿之庙，其御座楼南楼中央亦突出一建筑，尚为清代原物，是一砖砌基座上筑一木构小殿，完全无法作为演戏场所。普庙之“戏台”虽并不一定与须庙相同，但无证据表明该处为演戏空间，复原设计将其下部建为开敞式台榭有待商榷。

〈3〉 笔者曾撰文指出古代绘画中建筑形象与建筑实物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前揭杨煦：《两幅宫廷绘画所见建筑图像表现比较研究》）。我们难以过高估计图像对建筑表现的忠实程度，但该图中全庙各主要部分的大体形象均与现状相符，唯御座楼部分出现巨大的差异，令人难以相信这一引人注意的现象并非来自有根据的描摹。认为画家故意将一座形制简单的回形楼体加以复杂化，缺乏足够的理由。当将这种差异与上文所谈文献信息拼合在一起加以考察，文献会在一定程度上厘清图像的迷惑。

〈4〉 前揭《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

〈5〉 前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朱批奏折。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档号04-01-37-0029-002。



〔图十四〕洛伽胜境殿台基条石，下层为乾隆朝做法，上层疑后期做法。



西一座单檐歇山顶的单层殿堂，亦难以“楼”呼之。〔图四〕普庙全图上洛伽胜境处显示为一平顶楼房，正好为二层，且该楼为南北走向，坐落在御座群楼西北角厚墙上。图像中的表现在现存实物上有一旁证，即〔图十一〕所示大红台东群楼北半部的外侧向内收进一间，现在的洛伽胜境殿西檐已伸入这块缩进处。如果说该缩进处是为让出这一距离，那么缩进部分的南北长度与现洛伽胜境殿进深相比未免过大；若原存南北向二层小楼，这一缩进空间则相当吻合。

洛伽胜境殿现存台基阶条石为正方形截面的大方石。据王福山先生长期从事古建修缮工作所得经验，乾隆朝热河地区惯用长方截面的阶条石〔图十四〕。故现洛伽胜境殿很可能曾在后期被改建，在嘉道时期已演变为单层歇山木构〔参见图十〕，这在文献中并无反映。故此，“七辈喇嘛楼”当为今“洛伽胜境殿”之前身，而在乾隆时期这两个称谓是混用的。

（三）平台殿

在今大红台群楼北侧楼顶上，靠西为六方亭（“慈航普渡”亭）所在平台，靠东则有单檐卷棚歇山顶面阔三间的小殿一座，为20世纪80年代复原重建。该殿内是由大红台群楼内通往楼顶平台的楼梯，小殿起到一个为木构楼梯遮蔽雨雪的“楼梯间”功能^{〔1〕}。笔者查早期旧照，在Alfons von Mumm与Ernst Boerschmann摄于1904年前的照片中均可见该小殿形象〔图十五〕，与现在复原木构形制相同，而在〔图十六：上、下〕两幅1930年代的照片中则已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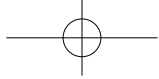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由于前述大红台群楼原比现状高出一层，该小殿绝非乾隆朝原物，而是红台顶层消失后在第三层台顶修建的。在乾隆三十六年《万法归一图》〔图七〕和四十六年热河志附图〔图四〕上，红台第四层顶相应位置绘有一藏式平顶小殿，并非木构卷棚歇山。

笔者曾对《万法归一图》所反映的普庙建筑细节的忠实性做了详细分析^{〔2〕}，而该图与热河志图对此小殿表现的一致性，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其原初功能是楼梯间吗？

仍须回到文献。乾隆五十四年《陈设档》关于大红台群楼有如下记述：“北楼三层……四层楼……楼·顶·平·台·上·平·台·殿·一·座，内面南宝座床一铺……北墙贴方琮书横披一张……五色布鹿马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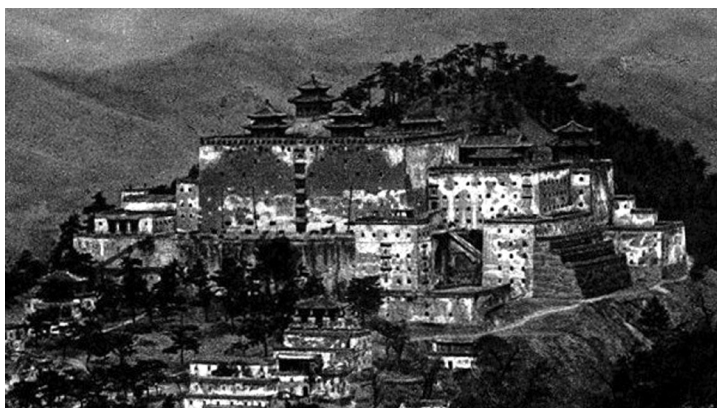
〔1〕 据王福山先生告，清末大红台群楼木构糟朽时，该处亦随楼板坍塌，勘查中在红台宇墙顶发现该殿北侧几块台基石仍在，据此推知该建筑的存在与位置。

〔2〕 前揭杨煦：《两幅宫廷绘画所见建筑图像表现比较研究》，页104—120。



〔图十五〕清末平台殿倒塌前影像

上:Alfons von Mumm摄于1902年之前;下:Ernst Boerschmann摄于1904年之前



六百八十二块，五色布白伞盖经三百八块，五色布六字真言经二百二十块……紫檀龕一座内铜镀金无量寿佛十五尊……墨刻梭罗橱九张，御笔金书《华严心境图》一张……”

此处针对群楼之“北楼”，按照三层——四层——楼顶平台的顺序记述，“平台殿”即当定位于今楼梯间位置(六方亭单有记述)。且文中未区分明间、次间、稍间，推测该殿较小，仅有一间。然而这一小殿中却置有宝座床，且陈列大量经文与佛像，无疑是一处重要的佛堂，绝非仅如后世所作楼梯间之交通功用。普庙《陈设档》的记述顺序是先将全庙所有设御座的殿堂顺序列出，然后再从山门开始记录宗教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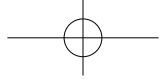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设空间，平台殿即位于档中第一部分。事实上，该殿是大红台楼顶上唯一设有御座的殿堂，也是全庙最高处的御座所在。

如果原平台殿既承担大红台群楼上下交通楼梯出口交通，又为一陈设御座的殿堂，一种可能的形制如〔图十七〕所示，其北侧为楼梯出口，南侧为一房间(开间和柱网仅为示意)，陈设御座，可供登临台顶时休息眺望，其形制则为藏式平顶^{〔1〕}。

至于该殿形制变更发生的时间，William Alexander绘制于乾隆五十八年的图中已经表现为一汉式坡屋顶〔图九〕，这或许提供了一个时间线索。然而，如果注意到该图将圆堡绘制为一葫芦形状的做法，再考虑到William Alexander本人未能随使团亲赴热河，而是根据亲赴热河的使团成员John Barrow与William Parish的速写图转绘成此图^{〔2〕}，该图像的信息真实度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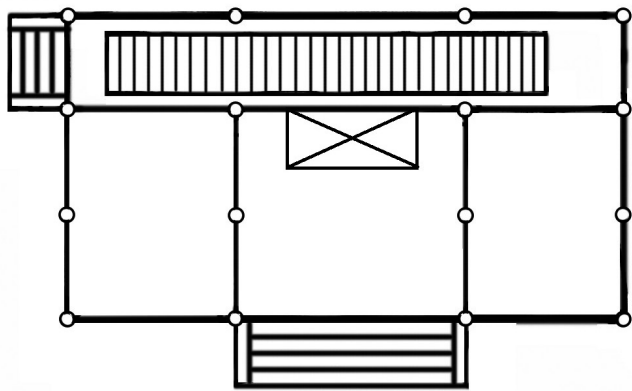
〔1〕 该推测受到王福山先生启发。

〔2〕 刘潞：《社会学的解读：英使团画家笔下的中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



〔图十六〕塔罩亭倒塌后影像

上:斯文·赫定摄于1930年;下:Hedda Morrison 摄于1934~1935年



〔图十七〕平台殿地盘平面推测

三 非原始设计的 后续添建建筑

（一）塔罩亭

1988至1992年的修缮工程在大红台顶部靠南复原了东西对称的两座重檐方亭，二亭原物在20世纪初即已消失。从Alfons von Mumm摄于1902年之前^{〔1〕}和Ernst Boerschmann摄于1902至1904年间^{〔2〕}的旧照中尚可见到二亭形象〔图十八：上、下〕；而斯文赫定于1930年^{〔3〕}、Hedda Morrison于1934~1935年^{〔4〕}所摄照片〔图十六：上、下〕中，大红台楼顶则仅存“慈航普渡”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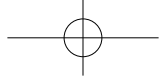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两座方亭在档案中被称作“塔罩亭”，二亭下方原为贯通三层楼体的小天井，树有两座自群楼一层一直通到红台顶部的紫檀木塔（木塔现状亦为复原设计）。木塔顶部高出台顶，塔罩亭之功

〔1〕 Alfons von Mumm, *Ein Tagebuch in Bildern*. Berlin, 1902, vol.1 p.246

〔2〕 前揭Ernst Boerschmann. *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 Verlag Ernst Wasmuth A-G, Berlin, 1926. p.38

〔3〕 Sven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Part 2*, Stockholm: Göteborg,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1943. palte. 34.

〔4〕 Hedda Morrison, *热河相册*,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原编号1023, 哈佛燕京图书馆编号186-005, 1934~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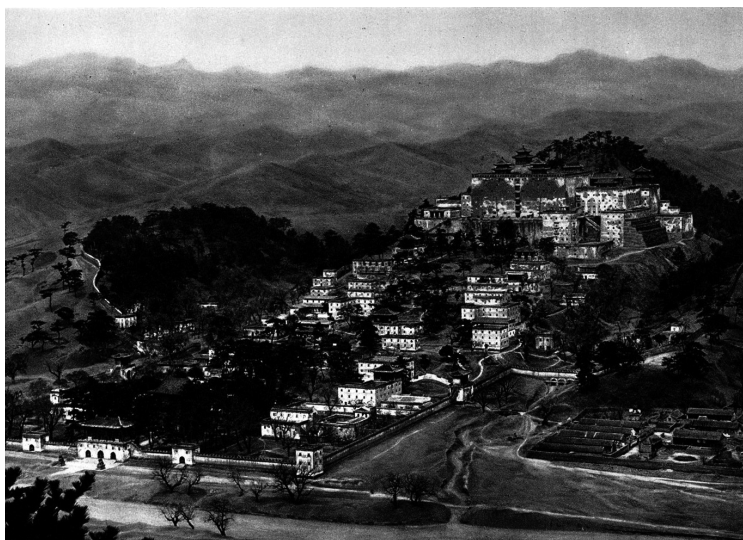


用即为避免木塔露天风吹雨淋而予以遮蔽^①。由于二亭坐落于大红台顶层拆除后的第三层楼顶，可以肯定它们不是乾隆朝始建之原物。《钦定热河志》插图〔图四〕与William Alexander绘图〔图八〕中亦均无塔罩亭。如果初始设计中便使得红台的高度不足以容纳木塔，而需加建塔罩以弥补，是不合情理的。乾隆朝时四层高的大红台应当完全容纳了木塔，根本不需要塔罩亭。实地查勘可知，今日木塔伸出台顶的高度低于大红台一层的层高，也说明木塔当初是结合红台内空间高度来设计的，而这也是大红台原为四层的一个旁证。洛克菲勒财团藏普庙图〔图十〕绘于红台顶层拆除后的嘉道年间，两个塔罩亭也恰在此时出现了。

据《热河园庭现行则例》卷四记载，该二亭至迟在道光十五年已开始坍塌，至道光二十五年坍塌已“情形过重，难以保护”。为“不至糜费”，当时并未修复塔罩亭，反而将其部分拆卸，仅“遮盖保护”^②。而二亭完全消失则在光绪三十年(1904)，当年八月的奏折记录了原委：“四面平台式群楼上下三层，每一面计十二间，惟南面群楼东西两梢间角上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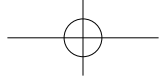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图十八〕塔罩亭倒塌前影像

上:Alfons von Mumm 摄于1902年前;下:Ernst Boerschmann 摄于1904年前



① 光绪年间奏折称“四面群楼系平台式上下三层，每面十二间，其东西角有亭二座，即塔罩，内安紫檀包镶木塔各一座，供诸小铜佛，所谓千佛阁者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松寿奏，档号04-01-37-0146-012)，错将“千佛阁”之名安于紫檀木塔。观察奏折内容，勘察大臣向皇帝详细描述了普庙修建原委和建筑形制：“奴才恭查普陀宗乘之庙乃乾隆三十五年万寿特建祝嘏之功德林也。其千佛阁则群藩祝禧所进之佛像也……”可见由于国力衰竭与秋狝活动停滞，至光绪朝时皇帝已对热河外八庙建筑甚为陌生。在这一情形下，大臣对普庙的认识也难免有失准确。

② 前揭《热河园庭现行则例》页162。



〔图十九〕千佛阁



有塔罩一座，每座约高六尺有余，内设紫檀木塔各一座，其塔计九层，每层计高五尺五寸，通连顶座约高五丈有奇，每层内设小铜佛一百二十尊。查此东西塔罩原依群楼为恃，因群楼坍塌殆尽，塔罩无倚，以致东塔罩先行坍塌落地，将紫檀木塔并小铜佛砸伤；其西塔罩……向西北歪闪，亦将及颓坍，情势甚虞。正拟奏请设法保护间，复据管庙园丞锡恩等报，称于七月二十六日戌时西塔罩复行坍塌落地，亦将紫檀木塔并小铜佛全行砸伤，并将万法归一殿头层前檐砸伤，四间门窗亦间有伤损，木植砖瓦堆积殿前……嗣因中外失和，銜與西幸，未能勘议覆奏……”^{〔1〕}故此二亭均坍塌于1904年^{〔2〕}。

（二）千佛阁

位于红台西南侧的千佛阁，为面阔五间的石墙院落，高仅一层〔图十九〕。千佛阁很可能不在始建时的设计方案内。普庙原为乾隆三十五年庆祝皇帝六十万寿而建，因当年工程失火，只好推迟一年竣工。但蒙古王公仍然在三十五年如期送来大量佛像为皇帝祝寿。千佛阁特为保存供奉这些佛像而建，乾隆三十五年八月所立千佛阁碑文记载了此事^{〔3〕}，故千佛阁的出现源于一个计划外的事件^{〔4〕}。从乾隆三十六年六七月间的三份《工程成数》奏报均未提到千佛阁的修建进度来看，该阁应早在三十五年八月便已快速落成，很可能作为普庙第一处宣告完工的部分，以应急表示对蒙古所献佛像的重视。正因如此，虽取名为“阁”，却仅为由四面单层房屋围成的院落，施工十分简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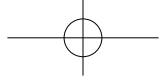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红台东侧与千佛阁对称的位置为文殊胜境与哑巴院之间的平台，是东侧白台蹬道与红台蹬道之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日，英贤、联荣奏，档号04-01-37-0146-007。

〔2〕 一般认为Boerschmann有关热河的照片拍摄于1906至1909年，但〔图十八：下〕显然摄于塔罩亭坍塌前，很有可能为Boerschmann在1902至1904年首次游历中国时拍摄，其影集中误记了年代。另据王福山先生告，修缮前塔罩亭处地面虽已随木构楼板坍塌，但大红台楼体砖墙较厚，原先亭子台基南侧部分位于砖墙上，保留了南侧部分台基石，就此得知塔罩亭的位置和台基尺寸；又在该处发现零星斗拱残件，成为复建工程木构部分的依据

〔3〕 “千佛阁碑记”见《承德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承德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编印，1978年；另见《热河园庭则例》卷四，前揭：《清代匠作则例》第三卷，页141。

〔4〕 乾隆三十五年，本已在北京北海修建了万佛寺，内供万尊无量寿佛。参见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活佛若必多吉传》页256，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间的联络交通区域，两截蹬道衔接十分自然[图十一]。而从西侧白台蹬道上端去往红台蹬道的路则因千佛阁阻挡，须向西、向北绕到千佛阁后方可登红台，似乎也表明千佛阁的建造影响了原设计的交通流线。

四 名称失载或功能被误判的建筑

（一）“呀嘎达噶楼”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十《布达拉庙工程成数》：“花台上呀嘎达噶楼十八间，头停铺墁方砖安装修俱得，现安做青白石神台”¹；七月初七奏报：“布达拉庙工除西面九间房并花台上呀嘎达噶楼以及……俱已完竣外……”²；七月十八日奏报：“恭照布达喇庙工除已竣之呀嘎达噶楼、九间房并……外，现今……”³

所谓“呀嘎达噶楼”由文字推断应坐落于“花台”上，又据其与“九间房”并列论述，故或应类似地处于主体建筑中大红台外围的位置。其实，与“九间房”距离最近的是紧贴其南侧的千佛阁，但千佛阁本属临时加建(见上文讨论)，且无任何档案、碑文表明千佛阁与“呀嘎达噶”名称之关联，故仍需从“呀嘎达噶楼”这一名称本身入手分析。

“呀嘎达噶”，档案中又称“雅曼达噶”，为梵文“Yamantaka”音译，意译为“大威德怖畏金刚”，是密宗无上瑜伽部父续主尊，且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护法神。王家鹏先生通过对清代宫廷宗教陈设的深入考察，发现清宫佛堂建筑存在一种重要的配置模式，即“雅曼达噶神坛”。现存雅曼达噶坛共七处，分布于紫禁城、雍和宫、圆明园和热河外八庙，其中普庙即存其一。王家鹏指出，普庙主体建筑白台基座“东南角为文殊胜境殿，面广五楹，进深三间。雅曼达噶坛就设于其内”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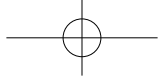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据王文援引嘉庆十三年十二月普庙陈设档，文殊胜境内西稍间面北供文殊菩萨，明间面南供“铜镀金呀嘎达噶佛一尊……小铜呀嘎达噶佛一尊”，除供桌、供器外，陈设有：“红漆描金箱一个，内盛……铜镀金嵌珐琅片火镰一把，绿子皮金片鞘花羊角鞘小刀一把”；“左设绿沙鱼皮珊瑚鞍鞦锦毡一分，回子锦鞍笼一件，青布鞍罩一件，黄毡鞍笼一件”；“右设红漆描金盒一个，内盔冠一顶”；“红漆描金箱一个……内盛甲挂裙十件，青缎鸾膀褂一件，黄绫绵甲衬大小十件……”；“右设弓架一座，上挂撒带一副，桃皮镶嵌腰刀一口；左右设熊虎皮各二张……随玻璃熊虎眼珠八支”。从陈设内容来看，雅曼达噶佛与文殊菩萨一同供奉，并配备熊虎皮、盛放皇帝衣饰和盔甲的箱子、摆放刀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十《布达拉庙工程成数》，和尔经额、永和奏。

2、前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朱批奏折。

3、前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朱批奏折。

4、王家鹏：《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



〔图二十〕花台上呀嘎达噶楼(文殊胜境) 采自《承德古建筑》



枪弓箭的兵器架和皇帝马鞍，基本符合王家鹏先生所总结的“雅曼达噶”坛供奉的基本构成，体现了大威德金刚护法司战的属性，唯所在方位为主体建筑之东南，与多数设置在西北有所不同。笔者另查乾隆五十四年《陈设档》^{〔1〕}，所载文殊胜境殿陈设与嘉庆朝基本相同。

故此，所谓“呀嘎达噶楼”所指应为文殊胜境殿所在楼体〔图二十〕。此处的另一佐证是《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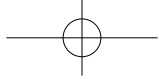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定热河志》对普庙牌匾的记载：“前殿……又十六楹，额曰千佛之阁……中殿二十楹又十八楹，后殿二十五楹，殿外檐额曰落伽胜境，曰文殊胜境，曰万法归一，皆兼四体书。”该处记载中殿、后殿的方位逻辑略有混乱，但就行文逻辑来看，中殿之“十八楹”当指向匾额记述顺序中的第二位“文殊胜境”。此处以楹数为开间数，恰与乾隆三十六年《工程成数》中“呀嘎达噶楼十八间”吻合。据王福山先生推测，“十八间”的数字当源于文殊胜境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所形成的十五间地盘加上中部为采光天窗而抬高的三间。而“花台”，应即指该楼下方二层盲窗的实心基座，或许得名于初建时不同于如今的墙体颜色。

（二）“哑巴院”

今文殊胜境楼东北、御座楼东南有一南北长东西窄的楼体，紧贴大白台基座和文殊胜境所在“花台”，外饰盲窗五层，下面四层实心砌筑，最上一层为厚墙围出的长方庭院，其内似原有沿四面墙体搭建的棚子遗迹，西墙北端开一随墙门，由“花台”东北的蹬道上至该处，向东可通过随墙门进入该院，向西可继续登上白台基座。该院在当地俗称“哑巴院”，并传皇帝莅临普庙拈香时僧侣不得活动喧哗，须集中在此院回避，故得名〔图二十一〕。

此建筑在档案中未有反映。观察“哑巴院”之结构，该楼绝大部分的体量均为实心基座，最上层庭院占楼体高度比例相当小。文殊胜境楼之实心基座亦相当厚重，但其上为供奉文殊菩萨和雅曼达噶佛的殿堂；而“哑巴院”用如此大量砖石砌筑仅为承托其最上供普通僧众回避处所，不合情理。笔者相信，该楼体量和结构上的重点在于厚重的实心基座，而非“哑巴院”，该楼体当有结构力学上的功用。

〔1〕 前揭《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



〔图二十一〕哑巴院所在楼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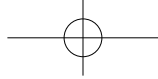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今天在普庙主体建筑之上，还可见到若干与“哑巴院”类似而无内部空间的大体量实心砖石砌体。主体建筑西侧、东侧和北侧的层叠块状，均为紧贴白台基座的实体〔图三〕。这些实心结构重量大，既不供人登临也无供奉，应当只有结构力学上的作用，即充当在侧面加强高耸的白台基座使其不致坍塌的“戗台”〔图二十二〕。笔者相信，“哑巴院”楼体主要意义也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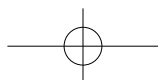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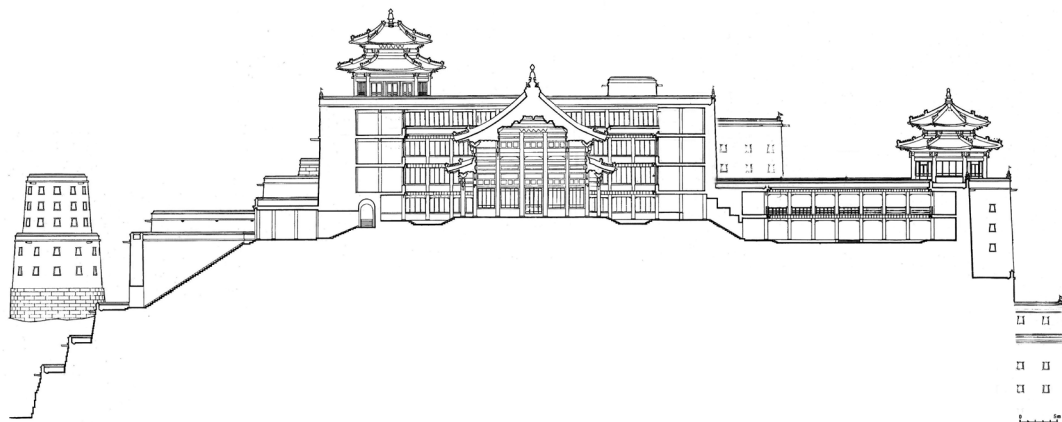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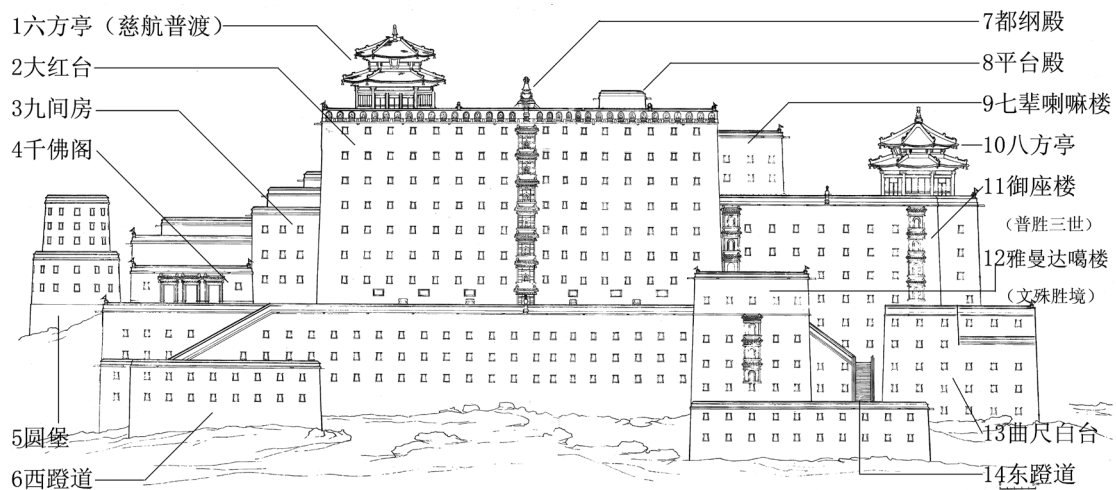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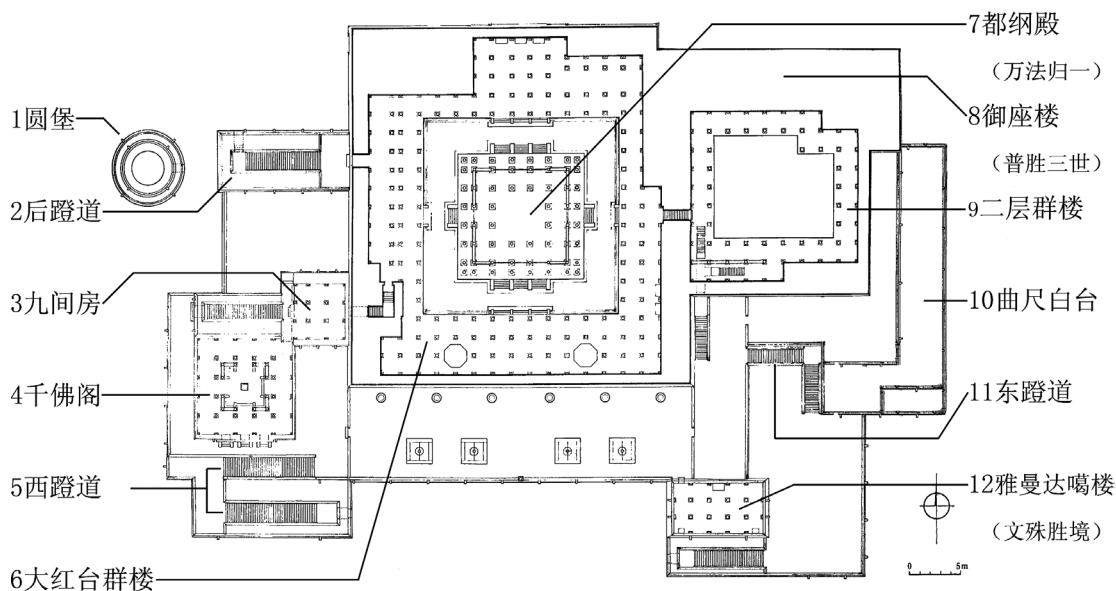
〔图二十二〕白台基座外西侧实心戗台（东向西俯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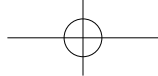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钦定热河志》图中没有这些戗台的形象，也未记哑巴院之设置。经笔者采访调查，戗台均非当代修缮为之，而是历史原建，很有可能添设于普庙竣工后的维护工程中。

前述乾隆四十年的坍塌事故后，普庙初建负责大臣受到从轻的处置，并立即进行了修缮工程。第二年，乾隆帝在其御制诗的附注中回顾了来龙去脉：“昨岁夏秋多雨，庙之南面红墙颓弛，牵引地面上层楼阁亦有倾者。即遣大臣勘验，知系原工筑土未坚，雨水渗入，致墙基鼓裂层卸而下，皆由前此承办各员不谙作法，尚非侵冒误工，故不加深谴。因命易大块石为基，层层夯筑，经楼、佛阁



〔图二十三〕普陀宗乘之庙主体建筑乾隆朝原状平面、正立面、纵剖面示意（作者基于天津大学测绘图改绘）





重加葺治，未逾年而葺工。闳整如前而巩固较胜于旧。”^{〔1〕}

这段文字令人惊喜地看到，皇帝对于描述实际工程之细节有很高的兴趣。尤当注意的是“易大块石为基，层层夯筑”，表明工程用大体量石材层垒的方式来加固主体建筑。今天所见层层叠落的钱台，应当正是实现这一加固措施的实物。“哑巴院”所在楼体可能即为乾隆四十年的维护措施而添加。

根据本文考证的结论，笔者在天津大学所制现状测绘图的基础上改绘乾隆朝原状示意图〔图二十三〕，可与现状图〔图三〕相参照。虽然千佛阁不属最初设计方案，但为尊重乾隆朝全寺竣工时的状况，仍将其保留。

结 语

以上对乾隆朝普庙建筑原状的考证，是热河藏传佛教寺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大型建筑组群的干预史会干扰今人对其设计思想和艺术史层面的探讨，这类研究需要对相关时期建筑状态有准确的把握。建筑在其生命期内会发生毁灭、改建、添建、称谓失传、功能变化与消退，这些情况在普庙均有体现，本文成果可能也仅是该庙建筑复杂演变史中能够基于现有材料被揭示的一部分。

附记：承德市文物局王福山先生与笔者同赴现场考察，提供发掘踏查资料及观点心得，并一直关心本文写作，在此致以特别感谢。本研究受到苏荣誉教授的指导与鼓励，蒙赖德霖教授、郑岩教授、丁焘先生、曹鹏先生、杨菁女士惠赐意见，资料收集获陈东先生、段牛斗先生、傅永海先生、王学深先生、刘阳先生大力协助，田冉小姐帮助制作了部分图片，在此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何 芳）

〔1〕 爱新觉罗·弘历：《瞻礼普陀宗乘之庙因题》，乾隆四十一年，《钦定热河志》卷八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8册页594。